

“气”乃万物之本源,人之寿夭取决于禀赋之厚薄,体质的强弱,与天命鬼神无关。还提出“妇人疏字者子活,数乳者子死”等有关优生学的正确见解,这无疑是对天命论的直接否定。特别是在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上,强调精神依附于肉体,人死则神灭的无神论和神灭论,对保持祖国医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有重大意义。

秦以来,药物知识更加充实,物理论基本形成,并出现了本草专著,有了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的本草专门学问。正是在此基础上,实现了我国本草学的首次总结,产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该书总结了战国以来数百年的用药经验,也给后世本草学的发展以原则性指导。另外,东汉时因炼丹术的兴起所引发的化学药物的炼制和使用,食疗、食养在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明显进步,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本草学的丰富内涵。这些又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本草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一、本草学的形成

(一)“本草”一词的出现

据现存文献考证,西汉晚期以来出现了以“本草”二字代称药学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:建始二年(公元前31年)，“侯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”。按,颜师古注:“本草待诏,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。”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:元始五年(公元5年)，“征天下通知逸经、古记、天文、历算、钟律、小学、史篇、方术、本草及以五经、论语、孝经、尔雅教授者,在所为驾,一封相传,遣诣京师,至者数千人。”《汉书·游侠传》也载有“楼护(西汉学者),字君卿,齐人。父世医也,护少随父为医长安,出入贵戚家。护诵医经、本草、方术数十万言,长者咸爱重之。”由此不难看出:本草学已成为一门与方术截然分开,且已达到一定规模的独立学科;本草书籍或文献,在当时应该说是存在的;诵读并通晓本草的学者已决非个别人。至于起用“本草”二字的缘由,后世学者每据一己之见,或云以草(植物药)为本;或谓“木”乃“木”之讹;还有据字义释“本”为“根”者,本草即“根根草草”。说法尽管不一,但对“本草”系指药学,在认识上古今并无二致。

(二)本草专著的问世

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从业师公乘阳庆处所得《药论》一书,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本草专著,惜已亡佚,难以考察彼时本草学之梗概。然究之淳于意的“诊籍”,似可看出药疗正逐渐取代针灸而成为医者治病的主要手段。另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神农黄帝食禁》,以及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·自序》中所涉《胎产药录》,皆可谓各有侧重的本草专著,亦因久佚而不得其详。现今可资研究秦汉时期本草学的文献,惟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《急就篇》,和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92枚医药简牍,人称《治百病方》(因其最后一枚题有“右治百病方”五字而得名)。(《急就篇》本是古代小学诸书之一,乃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中医药资料除述及解剖、生理、病名和治疗外,药物也是重要内容之一。共收药物35种(植物药34种,动物药1种),除艾、龟骨枯等少数几种药物,余皆见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而《治百病方》则是记载医方的竹、木简,共涉药名100余种(植物药62种,动物药11种,矿物药16种,其他药16种),内有80种见于《神农本草经》,且有其他本草学内容可供研究。应予重视的是大体上成书于东汉初的《神农本草经》,堪称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本草专著,该书的问世,标志着我国本草学已开始走上系统化、理论化的道路。公元2世纪时另有《雷公药对》四卷(已佚),陶弘景认为此书在药物主治和品种方面较之《神农本草经》已有所补充,并对药物的佐使相须亦有所论述。

(三)本草理论基本形成

秦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奠定,临证治疗学中药物已

取代针灸而占据主要地位,因而在总结以往用药经验的基础上,进一步对本草作专门研究,就成了中医学发展的必然需要。东汉以来《治百病方》已能根据不同病情,分别以白蜜、猪脂、乳汁等作赋形剂,制成多种剂型的复方。其制药法有“皆并治合”、“皆咬咀”、“煎之三沸药成”,还有“淳酒渍之”及鸡子黄入药“挠之三白”。给药法可分酒饮、米汁饮、酢浆饮等内服法和敷目、塞鼻、塞耳、灌鼻、指摩、涂之等外用法两大类。还认识到不同的给药时间会对药效产生某种影响,因而有“先铺饭”、“宿毋食”、“旦饮”、“暮吞”等区别,并有忌荤菜、酒辛、鱼、肉、房事与力作等服药禁忌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所体现的用药理论更趋深入。该书十分重视药物炮炙、煎法和服法,且能针对不同病情创制和应用了多种内服、外用的剂型。以炮炙而言就有炮、炙、熬、煎、酒洗、去腥、去咸、去节、去心、去滑涎、去皮尖、去芦、擘、碎、切、水渍及烧存性等;剂型除有汤、丸、散、酒、洗、浴、熏、栓外,尚有滴耳、灌肠、含化及软膏等,其中对煎药提出应据药性之差异,分别采用先煎、后入、绵裹、泡汁、烱、冲等法。其煎药溶媒一般用水(含泉水及井水),有时也用酒、醋(苦酒)。并能根据患者体质、病变部位、病情轻重、病程长短以及脏气盛衰、阴阳消长等具体情况,分别采用“平旦服”、“空心服”、“先食温服”、“顿服”、“分温再服”、“一日三服”、“日三夜一服”、“分温五合至夜尽”、“日三夜二服”等不同服法。另对药物剂量,已知用同样药味组成的方剂,由于主药或各药间剂量的不同,就会使治疗作用和君臣佐使的组合发生变化。前者有如桂枝汤和桂枝加桂汤之别,后者有如小承气汤、厚朴大黄汤、厚朴三物汤三方组成之异。

二、本草学的早期总结——《神农本草经》

秦汉之际,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,特别是内外交通的开辟和“丝绸之路”的畅通,使西域药材不断输入内地,少数民族、边远地区及南海一带的药物也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,加之临床医学的发展,无疑都对当时本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可以说,《神农本草经》(简称《本经》)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本草学进行了早期总结。

(一)作者与成书年代

《神农本草经》之书名最早见于梁代阮孝绪的《七录》,之后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称“梁有《神农本草经》五卷”。其实,早在西晋的某些文献中就已明确提到或直接引用过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内容,这说明是书在晋代以前便已存在和流传是可信的。至于成书的年代,有谓战国时代,有说秦汉之际,还有人主张成于东汉时期。但从该书的具体内容看,它和《内经》一样,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,大抵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集各种药学资料,而于东汉时最终整理加工成书的。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因为书中所记采药时节皆以寅月为岁首(汉武帝太初元年将以十月为岁首的“颛顼历”改以寅月为岁首的“太初历”),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时期,因为所载地名“皆后汉时制”,且晋人嵇康、皇甫谧等都曾引用或提及该书的内容。再者,书中每多重视养生、服石和炼丹,并有神仙不死之类的说法,这与东汉时期的社会风气也颇相一致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原书已于唐末宋初散佚,现在所见的传本,是后人根据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诸书所引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原文辑复而成。如1616年明代卢复的辑本,1799年清代孙星衍、孙冯翼的合辑本,1893年的顾观光辑本和1854年日人森立之辑本等。其中以孙氏叔侄的合辑本较为完善,流传较广。

(二)《神农本草经》的主要贡献

《神农本草经》在我国本草史上的主要贡献总括有二:其一,为后世本草专著的撰写确立了基本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。如先